

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



百年苦梦

孙郁著



群言出版社

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



A0929112

D663.5
S977 ✓

百年 苦梦

孙郁著



群言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苦梦: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/孙郁著.

—北京:群言出版社,1997.9

ISBN 7-80080-198-5

I. 百…

II. 孙…

III. 知识分子-社会心理-研究-中国-文集

N. D663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8240 号

群言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)

北京先锋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5印张 2插页 270千字

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4000册

*

I·46

定价:16.80元

描述20世纪中国文人的心态史,对我来说是件很痛苦的劳作,我曾经想绕开这些灵魂,歇息于平淡、宁静的时空里。然而终于未能如愿,我和这些形形色色的独行者们纠缠上了。

写作这本书的时候,我一直在想:中国文人灵魂最缺少的是什么?我们的现代化为什么经历了一百余年的风风雨雨才开始起步?鲁迅式的忧患还会延续多久?下一个世纪的公民能否体味到我们这一代以及上几代人的苦涩?

目 录

梁启超:启蒙的悲欣	(1)
章太炎:旷世奇音	(18)
王国维:辉煌与沉寂	(35)
周氏兄弟:绝望与逃逸	(56)
胡 适:自由之梦	(76)
瞿秋白:悲剧人生	(95)
茅 盾:苦涩的初梦	(113)
巴 金:反抗与忏悔	(127)
梁漱溟:拯救儒学	(153)
陈寅恪:“遗民”歌哭	(167)
费孝通:乡土情怀	(186)
钱钟书:写在人生边上	(201)
唐 弢:未完成的雕像	(215)
王 瑶:拖着历史长影	(229)
张中行:哲思与激情	(240)
汪曾祺:古魄新魂	(256)
王 蒙:从纯粹到杂色	(267)
邵燕祥:诗人与战士	(282)
张承志:血色的圣火	(302)
赵 园:另一种品位	(321)

王晓明：历史的宿命	(331)
鲁迅传统：不朽的主题	(345)
后 记	(361)

梁启超：启蒙的悲欣

1

二十世纪初，中国社会舞台上，梁启超的活动能力及范围，为许多人所不及。他的影响力之大，亦为同代众多学人、政客无法比肩。在接触《饮冰室全集》的时候，我被其广博性和复杂性吸引了。这确是一个杰出的人物。他的广阔的视野，非凡的才华，巨大的气魄，为近代中国的开蒙，做了众多的努力。广而不精，躁而不稳，或许影响了他在精神哲学上成为巨人的可能性，但也恰恰是他的政治的情怀，改良的壮举，治学的毅力，为我们民族走进现代，做了不朽的铺垫工作。

在北京，我一直想寻找他的遗迹，可是除了在故宫看到他的几幅字外，尚未找到更能亲近他的世界的旧物。有一次在故宫，不知怎么竟记起他出没于此，和皇室贵族周旋的故事。遥想当年他为变法、立宪、护法、倒袁所做的义举，顿有种万物皆逝，惟先生遗容不朽于天地之叹。可中国人向来喜爱遗忘，梁启超当年的慨叹，在今日尚有可呼应的地方，但人们却早已鲜提及于他，似乎是一朵凋谢的花，早已不知飘落于何处了。

有一次我去上海，在旧《申报》馆的遗址，曾徘徊良久。记得当年他在黄浦滩头秘密撰写反专制的文章，以及后来为《申报》

开辟专栏,倡导立宪的事情,好像已成了久违的乡人,在漠然的记忆里,残存的仅是淡淡的叹惜。梁启超在文章的辞法、文学的深度、哲学的顿悟、法学的建构上,都算不了什么巨匠式的人物,那些激情有余而理论并不周密的文章,令人自然也可挑出许多不足。可在那样一个时代,为变法、建立共和而勤奋奔走的日日夜夜,当为后代文人的一种表率吧?

梁启超被喻为近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,也许并不过分,他的惊人的学识,后世学人中一直难以与之相提并论。谈近代史最关键性的东西,我们差不多都离不开他。变法革新,他是参与者,介绍域外文明,他是开风气之先者;创立新式报刊,他是开拓者……从倡明“新民”之说,到力主立宪,从依靠军阀实现改良,到晚年孤独地著书立说,其足迹遍及中外,进取与保守、明朗与暧昧、聪慧与昏庸,可谓一直伴其一生。这是个复杂的人物,也是近代社会的一面镜子,在这个丰富的人生阅历中,我们看到的是一幕幕悲喜交加的人生戏剧。

2

梁启超 1873 年生于广东省新会县,字卓如,号任公。1884 年,年仅 11 岁的梁启超便在广州成为秀才,人们把他看成一位神童。五年之后,他又考中了举人,一时成为闻人。应当说,少年梁启超有着相当坚实的功底,国学中精华的东西,很早便被他领会到了。按中国人以往的经验,少年得志的他,应在为官的道路走下去,在仕途中干一番更大的事业。但偏偏是社会发生了变化,西学已在东南沿海传播开来。广东是最早被西化的地方,鸦片战争且不谈,仅西洋传教士在那里的多年活动,便早已把域外学术传播到知识界中。大约 1890 年,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,这是他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。在康有为那里,传统的今文经学,与西

方的一些学理，被交糅起来，形成一套新颖的维新意识。这对梁启超的影响甚大。在跟随康有为的几年中，梁启超思维大开，西洋的进化学说，与大同意识，在他的思想中扎下了根，立意改革中国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思想，也在此时形成。随后几年中，他跟随康有为进行“公车上书”，从事“戊戌变法”，名声在中国大震。康梁学术与改良精神，是近代史上最具迷人的篇章。在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之前，梁启超与其老师康有为，实际上扮演了社会变革精神领袖的角色。

中国近代改良思潮的出现，固然与西学东渐有关，但其生成过程里，对旧有的国学进行重新的整理，重新认识传统，是那一代人共同的课题。康有为、章太炎等人，走的是这条路子，梁启超亦然。总观梁氏的一生，除了后来积极参政以外，他大多的精力，用在学术的整理上。办教育，鼓励新学，办报刊，研究国故，可谓终生不渝。梁氏一生，流亡海外的几年生活，颇让人感动。他主办的《清议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，为近代启蒙做出卓越的贡献。他在《三十自述》中说：

尔来垫居东国，忽又岁余矣。所志所事，百不一就，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。空言喋喋，无补时艰；平旦自思，只有惭愧。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，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，兹事虽小，亦安得已。一年以来，颇竭绵薄，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，然荏苒日月，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。惟于今春为《新民丛报》，冬间复创刊《新小说》，述其所学所怀抱者，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，冀以为中国国民道铎之一助。

从文化入手进行改良，这是近代革命的必然之路。读梁启超后来

的文章,大致可以理出他的思路来。无论是从政还是论学,其宗旨是一以贯之的。可以说,中国所以有五四,有近代变革,梁启超那代人,功莫大焉。

梁启超是个知识博杂式的人物,我最喜欢的是他的学术、史学思想,在“知”的一面,他无疑是一代宗师;而“行”上,却不得不打一点折扣,太儒化,便使其生命之旅分成两半。这种分裂的人格,现在想来,是有许多可感可叹之处的。二十世纪的许多文人,在“知行合一”方面,均未能协调好。近代以来,文化上的硕儒涌现出一大批。可偏偏在付诸实践上,均碰了壁。悲剧几乎成了那代人的生命总结。梁启超的一生,便一直处在这种“知”、“行”的矛盾中,直到死,亦未能摆脱这种困惑。也恰恰是他的这种困惑,使他的价值选择,变得悲壮起来。读他的治学文章,没有多少是闲适之作,那些关于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宗教、文学、史学等内容的新思维,是近代先觉者的智慧之光。梁氏的作品,标志着近代人新价值路向的选择的自觉;那一代寻路人的诸多痛苦与希望,都可在他的文字间找到。

梁启超身上最诱人的地方,是不断地进取,一直和昨日之我战。这决定了他不满于现状,有求变之心。从早期倡明变法,到推动宪政运动;从与袁世凯合作搞“国权主义”,到全力反袁,发动护国运动,他的思想一直在变化之中。他晚年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谈及自己时说:“启超‘学问欲’极炽,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,每治一业,则沈溺焉,集中精力,尽抛其他;历若干时,移于他业,则又抛其前所治者。以集中精力故,故常有所得;以移时而抛故,故入焉而不深。”这很有点自嘲,但所云恰当,也可说是自身的一个画像。虽一生涉猎之面甚广,缺少精深之学,但他那种为中华文明而苦战之心,真是让人感动再三。

由于不断在知识上求新、求深,在骨子里,他是一个乐观的

文化人。虽然他也说过人生是以悲剧和失败为结束的话，但其气质中，一直蕴藏着进取的意志。1921年，在北京哲学社的一次演讲中，他说自己的人生观有两样事情做基础：“一、责任心；二、兴味。人生观是个人的，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观，各人的人生观不必都是对的，不必于人都合宜。但我想，一个人自己修养自己，总须拈出个见解，靠它来安身立命。我半生来拿‘责任心’和‘兴味’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，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。”这很明白地道出他生活的准则和人生情调。很难说他的哲学与学术思想都切中了事物的本质，但他的那种把人生学问化、责任化、趣味化的个性，对后世知识分子，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。我们从毛泽东、鲁迅那代人身上，便可看到这一点。

3

梁启超说不上是一位哲学家，可他一生著述中，谈哲学的文字甚多，其涉及的方面，也十分广阔。他的学术范围，上及远古，下接近代，又对十八世纪以来的域外思潮，多有所研究，可说是个杂家。梁氏思想，早年受到康有为启发，对英美诸国的科学主义渐有了解，尤其对人道主义、进化论等，颇为注意。后注重佛学，研究儒家精神，并参以康德学术，思想渐成套路。我觉得他对诸种哲学的思考，不是从学理出发的，他尚不具备哲学家的基本素质。他是以思想者的情怀，广泛吸收诸家思想，并以此经世致用。在读他的文集时，不知怎么，总想起后来的胡适，他们均跳出经院哲学的圈子，以儒生的处世方式，将人道感和科学意识渗透于行为之中，或许，这是那一代人的宿命。国难当头，处于忧患之时，自然不会有纯粹理性的思考，从别国窃得火种来，宗旨还在点燃启蒙的火炬。这或许也是那一代人知识范围广阔，思维空间开放的一个原因。

欲动摇古中国的儒道学说，一是西方的神学，二是科学理性，三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欧美的现代哲学。梁启超是较早地看到上述几点的先觉者。但他不是基督教徒，他对欧洲神学多有微词，与佛教相比，梁氏认为基督教缺少入世的精神。而恰恰是佛教，把此岸与彼岸较好地结合起来。他后来曾倡明以佛教统一国人思想，说明在根本点上，他拒绝了基督精神。在对域外思想的引介上，他特别注意到了进化论、卢梭思想、边沁主义、康德学术等等。他不是将此纳入形而上思考中，而是引入到认识论里，把这些，当成实践的哲学。显然，在对古典哲学的理解上，他还停留在一般的常识基础上，这使他一直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、深刻的价值哲学。与后来的鲁迅、周作人比，梁启超缺少对人的心灵的入木三分的审视。他太常态了。西方的学理在他那里，常常被定位于经世致用的儒学风格上。所以，其文章，像个热情青年的激烈的演讲，在受到情感的感染之后，剩下的常常是空漠的微凉。梁启超一生未能摆脱此类的偏颇，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憾事。

但梁氏一生最大的功绩，在于输进了西域的新的思想，他差不多把欧美日最新的文化思潮，都引进到了中国。1898年，他在日本创建了《清议报》，此报的特点是，一、倡民权；二、衍哲理；三、明朝局；四、厉国耻。梁启超说：“此四者，实惟我《清议报》之脉络神髓，一言以蔽之曰：广民智，振民气而已。”不久，他又创办了《新民丛报》，此刊出版后，继承《清议报》传统，更为注重教育普及与西方思潮的介绍，在近代启蒙历程中，立下了一座丰碑。

那时梁启超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想，是驳杂的，但集中的几个问题却是：讲进化、开民智、变科举、兴民权、设议院、倡改良。这些思想的核心，是进化论的学说。在梁氏看来，中国欲进步，不批判儒道学说中凝固的哲学观不行。所以他说：“凡在天地之间者，莫不变。昼夜变而成日，寒暑变而成岁。”（《〈变法通议〉序》）

他认为，历史是进化的，中国倘不进步，无疑则死。因此，他高呼道：“今日之中国，过渡时代之中国也。”“人间世无时无地而非过渡时代，人群进化，级级相嬗，譬如水流，前波后波，相续不断，故进无止境，即过渡我已时，一日无过渡，则人类或几乎息矣。”（《过渡时代论》）谈过渡，讲进化，便涉及到两个问题：一是为什么事物是进化的；二是怎样完成进化。此两点，他费时颇多，用力最勤，从物种演化、社会变迁、神学革新，一直到科学进步，梁启超写了大量介绍文章，可以说播下了知识之种。但要在中国进行改良，第一动力应是什么呢？在他看来，便是改造国民性。国民性不改，中国欲真正站立起来，恐难而又难。问题是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武器是什么，那时候他选择的，只能是西洋的学术思想了。他写下了大量介绍卢梭、培根、康德、亚当·斯密、孟德斯鸠、笛卡尔、达尔文等人的文章，有的文章体味之深，实令后人惊讶。例如对欧洲哲学分支的梳理，是准确的。《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》一文，对培根、笛卡尔的描述，颇得要领，尤其对笛卡尔“破学界之奴性”的“怀疑精神”的引介，可谓为学界输进了一枚炸弹。他叹道：“我中国数千年来，学术莫盛于战国，无他，学界之奴性未成也。及至汉武罢黜百家，思想自由之大义渐以窒蔽，宋元以来，正学异端之辨益严，而学风之衰益甚。”要改变此精神，便不能不有笛卡尔精神，所以他说：“第一，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；第二，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。我有耳目，我物我格；我有心思，我理我穷。车驱之，车驱之，何渠不若汉。”这是了解梁启超思想的重要线索。其所长在于敢于怀疑，敢走异路，不拘于旧法；但随之而来的，却是多变，空泛。不订于一尊不能说坏；但无重心，也使他的意识呈现出前后不一的地方，细说起来，有很多可总结的教训。

梁启超引入了那么多哲学思想，但没有一个被其深入地钻

研下去,他最后的落脚点,还是转入到中国问题的思考上。我以为他在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,是建立了“新民”的理论。把解决国民素质问题,看成文化改良的入口,不能说不是远见。“新民”说的核心,是创立新宗教、新风俗、新学艺、新道德、新人格、新人心。欲完成此点,他看到,离开教育和政体改良,是不行的。因此,他在史学、文学、哲学、教育学、地理学、政治学诸方面,多处入手,试图打开“新民”的途径。在这个劳作过程中,他从根本的价值点上,推翻了旧儒学中陈腐的意识,把自由、平等的意识,灌输给人们。他从“独立与合群”、“自由与制裁”、“自信与虚心”、“利己与爱他”、“破坏与成立”几个方面,清理了旧精神痼疾,其思想的摧枯拉朽之力,给世人的影响颇为巨大。1902年,他发表了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,试图从感性的艺术形式出发,寓教于乐,把人的解放与艺术教育结合起来。谈小说和“新民”的关系,梁氏不免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,他自然对后来文化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,但在那样一个时代,重启蒙,兴新学,也是不得已的选择。同年,他还写下了《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》,对佛教兴国,寄托了巨大的希望。他认为佛教信仰乃“智信而非迷信”,“兼善而非独善”,“入世而非厌世”,“无量而非有限”,“平等而非差别”,“自力而非他力”。在他看来,佛教取这些特点,对统一国民思想、增进人生的信念作用甚大。此外,他还从文化学等角度,论述了“新民”的重要性,《保教非所以尊孔论》、《地理与文明之关系》、《文明与英雄之比例》等文,对构建新文化,有殊多奇想。这些文字,实际上已构成了五四新文化的先声。倘读一读陈独秀、胡适后来写的文章,是可以感受到梁启超的余热的。

统观梁氏那时的思想,其重点在于兴国。文化的改良,旨在国家的改良。我觉得他的价值在于打开了新的思维空间,将西方的价值观与文化观输入到中国来。这些思想启发了他建立一种

新型的社会模式和文化模式的主张。但这个模式应如何建立，他是朦胧的。他的“新民说”能否有更为具体的操作方式，亦是个问题。但我以为重要的不在于他是否开出了药方，而在于把人们领进了新的天地。他发现了“人智日新”的生成不均来自于外力，而更主要的产生于人类自己，所谓“尽人力则足以制天然”，便是一种自信心使然。总的说来，梁氏的哲学属于人生的行动的哲学，群体自立自省自新的哲学。这一点倒颇有点像孔夫子，看他后来积极参政，为立宪而做的诸多努力，则可感受到其精神世界儒学的气质。他后来变成保守主义者，或许也是这种儒学式的意识滋生的结果。这其中的甘苦倘能理清，便可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原型的东西。

4

我一直觉得梁启超的思想库中，最缺乏的是对个体的人的生存价值的彻底的反诘，缺乏文化革新中的义无反顾的态度。看他对孔子与佛学的态度，便可知其精神暧昧的一面了。他后来倒向“立宪派”，反对孙中山式的革命，便说明温和主义的文化情怀，在构建新世界时，缺乏果决的气魄。戊戌政变的失败，对他是个打击，而变法求强的热情并未减退。那时他还在大谈进步、革新，主张思想的解放。但到了具体的社会变革，其精神，便倒向了保守一面。梁启超的保守，是建立在东西文化差异，与本国实际现状的基点上的。他觉得中国社会的首要问题是国民素质问题，流血斗争与暴力革命，只能产生民族复仇主义，于解决社会问题无补。所以他提出了“开明专制”。这与孙中山的排满兴汉主张形成对立之势，其保守性明显地表现出来。梁启超的守旧并非遗老遗少主义，而是把社会的进步，与改良结合起来。这一思路，在当时受到许多人的批评，但坦率说来，梁氏的观点，并非凭空的

杜撰，是自有其道理的。暴力革命，在根本上不能解决国民素质问题，这已被身后的历史所证明。但对于像满清这样一个腐败政府，不革命行么？思想是一回事，现实又另是一回事，我们在梁启超的悲剧与中国社会后来的悲剧中，是不是可以感受到一种选择的无奈？

梁启超的可叹处，在于文化上的温吞态度，阻止了他道路选择的排它性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欧洲的旅行，使他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文化保守主义态度。《欧游心影录》中对汉文明的自信心，似乎比先前更坚定了。他突然感到了汉文明的一种优越性，一种新的精神依傍情绪，开始在他那里滋长起来。他说：“第一步，要人人存在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；第二步，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研究他，得他的真相；第三步，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，还拿别人的补助他，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，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；第四步，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，叫全人类都得着他的好处。我们人类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，我们对人类全体的幸福，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。”这一思路没有什么不对的，但问题是，它削弱了对旧文化的反省，当民族自大感滋长的时候，文化的改良是行不通的。二十世纪初的中国，正处于万马齐喑的时候，梁氏的沙哑的声音，对于昏昏然中的国人，不会有振聋发聩的作用。实际上，辛亥革命后，真正给国民带来信念的是孙中山的革命派，是胡适、鲁迅那一代的启蒙主义者。在急剧变化的岁月里，应当说，梁启超有些落伍了。

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大国，旧的积弊如不彻底清除，谈改良，有时就不免空洞。梁启超看到了民众的落后性，但却没有看到造成这种愚民现实的文化原因与体制原因。虽然在学理上他意识到了古文化落后的一面，但在对孔子哲学与佛学上的暧昧，使他的精神触角只深入到文化的表面，便停止了。应当说，谈“新

民”，倘不彻底清算儒道释与专制文化机制的关系，要达到“立人”的目的，只能是空谈。梁启超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新文化与新社会制度的建立，他始终是以改良者的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中来。参与改革，自然要设想具体的操作，这和纯粹文化人的臆想就有了区别。在他的矛盾的心理中，我常常想起后来的胡适，在对改良与革命的关系上，两人确实有相近的思路，不过梁启超变得更为保守一些罢了。我以为梁氏的魅力常常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基础上的，他明明看到了中国顽固的社会心理，但却不想用巨变的方式解决之，而是选择了绕道而行的办法。与那些钟情于某某主义的激进者相比，他的观念似乎更为老成，没有过火之处。读他关于社会改良的文章，是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苦楚的。他对中国了解得很清楚，从远古到今，几乎被梳理得清清楚楚。中华文明的历史使他感到，渐进更为合理，在固有的文明中生成新的文化机制与社会机制，是一种希望所在。这一点，他与后来的新儒学，在某些方面有了相近的体验。从倡导启蒙，到保守主义，这是他一生悲剧性的选择，他无法超越旧的现实，从他大量的文字中，亦可见出内心深处痛苦的冲突。

这是中国近现代令人最困惑的价值难题。走什么道路，耗去了几代人的心血。梁启超后来反对孙中山，反对共产主义，渐渐地与青年人和革命激进主义远离了。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，一种强烈的孤苦在折磨着他。他感到自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。二十年代初，他在《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》一文中描述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看法，他痛苦地说：“我两年来，对此问题，始终在徬徨苦闷之中，殊未能发现出一心安理得之途径以自从事。所谓苦闷者，非对于主义本身之何去何从尚有所疑问也，正以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，而在进行之中必经过一种事实——其事实之性质，一面为本主义之敌，一面又为本主义之友，吾辈应付此种